



## 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

乐爱国 陈 昊

**摘 要:** 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最初在日本朱熹哲学研究影响下而形成的从理气论出发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对于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 民国时期;朱熹哲学;日本影响;理气论

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受到相应的关注,相关的学术著作随之得以翻译出版,并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朱熹哲学研究同样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因此,要把握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一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所受到的日本影响。

### 一、学术著作的译介

在中国,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是 1916 年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需要指出的是,1910 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虽不以“中国哲学史”命名,但其中所述的内容,实际上是属于中国哲学史。该书所述第三期“宋明理学时代”、第九章“朱晦庵”,正是对于朱熹哲学的最早的系统阐述。然而,在此之前,日本于 1888 年出版内田周平《支那哲学史》,1898 年出版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学史》,1900 年出版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均已开始了对于中国哲学史、包括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其中以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最为系统和深入。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的中译本出版。该书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古代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世哲学”三个时期;“近世哲学”分为“北宋哲学”“南宋哲学”,直至明代哲学;其中“南宋哲学”主要有“朱学”“陆学”等部分(详见图 1)。

在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中,“朱学”部分主要有:第一节“传并书”;第二节“哲学”,分为:第一款“理气”,第二款“理之统一太极”,第三款“气之殊别”;第三节“自然哲学”,分为:第一款“天地万物发生论”,第二款“天地论”,第三款“万物论”,第四款“结论”;第四节“心

支那哲學史卷四

金范臣譯

山陰 湯整先太史鑒定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閱

文學士 遠藤隆吉 著

第二章 南宋哲學

叙論

羅豫章李延平時宋之社稷漸蒙夷狄之難建炎元年西曆一千一百二十七年高宗即位南京宋之社稷遂南國號南宋以區別從來之北宋

宋自太祖以來養成慷慨氣節之風至此灼灼焉實現於士人之間學術亦頓呈活氣朱子為宋代學術之大成者陸子為實行家陳同甫為實際派之代表者樹旗幟於一方各不相下其起也若互相反動而然其餘張南軒呂東萊之徒又不失為一代之碩學名士然其間學術皆不外淵源於北宋諸家擴張之至於大成耳

甲 朱學

一 朱子

第一節 傳并書

朱晦菴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與李延平同學於羅豫章登進士第就官不贊金國之和議遂忤宰相秦檜而去官嘗為閩之延平尤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後寓尤溪城外之毓秀峯其年九月晦菴生幼穎悟與羣兒異四歲時父指天教之曰天忽然問曰(天上更有何物)五歲一云八歲時讀孝經即題於孝經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图 1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的中译本

性论”，分为：第一款“性”，第二款“心”，第三款“心性情”；第五节“工夫论”，第一款“格物穷理”，第二款“存夜气”，第三款“静坐”，第四款“结论”；第六节“结论”。此外，该书还有“朱子之后继”一节，主要论述了朱熹后学陈淳，并在“陆学”部分附“朱陆之折冲”一文，讨论朱陆之辨。

1925年，赵兰坪根据日本高濂武次郎《支那哲学史》编译成《中国哲学史》出版，其中指出：“东邻高濂武次郎博士，竭其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数十年，所著《支那哲学史》一书，久已风行彼邦。余乃不揣冒昧，略参己见，加以注引，采其大意，译成浅显文语，约得三十万言，分订古代、中世、近世三卷，以应社会一般人之需要，不作学者专攻之典籍。”<sup>①</sup>该书第三卷“近世哲学史”第一篇“宋代哲学”（乙）“南宋哲学”第二章“朱子”分为：第一节“略传”；第二节“学说”，又分为第一款“太极及理气二元论”，第二款“性说”；第三节“结论”；第四节“朱子后继”。此外，该书还有“朱陆折冲”“朱陆二派之异同”等节。

1926年，日本三浦藤作《中国伦理学史》的中译本出版。该书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篇，“近世”第一章“宋代之伦理思想”第十节“朱子”分为“宇宙论”“人性论”“伦理说”。“宇宙论”又分为“理气论”“万物生成论”；“人性论”又分为“本然性与气质性”“心性情之区别”“人心与道心”；“伦理说”又分为“理想论”和“修为论”。此外，该书还有“朱学之承继者”一节。

同年，日本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的中译本出版。该书分为上世哲学、中世哲学、近世哲学三部分，“近世哲学”第二编“南宋哲学”第三章“朱晦庵”分为：第一节“略传及著书”；第二节“本体论”；第三节“心性说”；第四节“伦理说”，又分为一、“仁的组织”，二、“修为论”；第五节“鬼神论”；第六节“结论”。此外，该书还有“朱门诸子”“朱陆的争点”等章节。

除以上所述，1935年出版的日本宇野哲人《中国哲学概论》的中译本，1939年出版的日本武内义雄《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中译本，这些著作也都包含了对于朱熹哲学的阐述。

应当说，以上日本学者所撰有关“中国哲学史”或“中国伦理学史”的学术著作，通过翻译出版，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包括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并产生了很大影响。蔡元培曾在《自写年谱》论及他的《中国伦理学史》，说：“《中国伦理学史》，虽仍用日本远藤隆吉氏《支那思想史》之三时期分述法，叙述的材料，亦多取给于此书，而详其所略、略其所详的却不少。”<sup>②</sup>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不仅对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具有影响，而且由此对后来各相关研究都产生影响，其中也包括对于朱熹哲学研究的影响。

## 二、论述框架的相似

从以上日本学者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论述基本上是从朱熹的理气论出发，大致包括理气论或本体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或伦理说，并且还论及朱熹门人和朱陆之辨。与此相似，民国时期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基本上也依照这样的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中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蔡元培不仅接受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古代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世哲学”三期而把中国伦理学史分为“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和“宋明理学时代”，而且也接受了其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从朱熹的理气论出发。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熹的论述，除“小传”之外，分为：“理气”“性”“心情欲”“人心道心”“穷理”“养心”“结论”等节。先论“理气”；然后论“性”“心情欲”“人心道心”，属“心性论”；又论“穷理”“养心”，属“工夫论”。此外，在对陆九渊的论述中，还包括了“朱陆之论争”一节。

谢无量对朱熹哲学有过深入研究。他不仅在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对朱熹哲学作了论述，而且还于同年出版了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朱子学派》。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不仅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上古哲学史”“中古哲学史”和“近世哲学史”三个时期，而且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

<sup>①</sup>赵兰坪：《中国哲学史》“赵兰坪序”，国立暨南学校出版部1925年。

<sup>②</sup>蔡元培：《自写年谱》，载《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318页。

为“太极及理气二元论”“性说”和“修养之工夫”三节,还有“朱子门人”“朱陆异同”等章节,因而与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多有相似之处。谢无量《朱子学派》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更增加了对于“宇宙发生论”和“鬼神论”的论述,而在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那里,对于“自然哲学”的论述,不仅有“天地万物发生论”“天地论”和“万物论”,而且在对“万物论”的论述中,同样包含了朱熹的关于鬼神之见解。

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该书在给“哲学”下定义时指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还说:“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四、怎样才能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sup>①</sup>胡适的这一“哲学”定义,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正是根据胡适对哲学的理解,周予同于1929年出版的《朱熹》第三章“朱熹之哲学”,开宗明义便是:“哲学内容之区分,学者说各不同;就其简明而有系统者言,自以区为(一)本体论、(二)价值论、(三)认识论之三分法为优。”<sup>②</sup>并将该章分为:第一节“本体论”,又分“理气二元论”“理一气殊说”;第二节“价值论”,又分“伦理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第三节“认识论”,又分“知与行”“致知与格物”“穷理与读书”。

周予同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虽然主要是基于胡适对于哲学的理解,但是,从“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三方面入手,仍然可以从中看到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的痕迹。此外,这一时期的黄子通《朱熹的哲学》(1927年)分为“宇宙论”“论性”“论仁”和“论修养”四节;钟泰《中国哲学史》(1929年)对朱熹哲学的论述分为“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居敬穷理”三节;贾丰臻《宋学》(1929年)把“朱子”章分为“哲理说”“心性说”“修为说”,以及吕思勉《理学纲要》(1931年)和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七):第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1931年)对朱熹哲学的论述,大都可以从中看出受到日本从理气论出发的论述框架的影响。

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同样是基于胡适对于“哲学”的理解<sup>③</sup>,并且认为,“哲学”包涵三大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其中“宇宙论”又可分为本体论和狭义的宇宙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该书“朱子”章分为:(一)理、太极,(二)气,(三)天地人物之生成,(四)人物之性,(五)道德及修养之方,(六)政治哲学,(七)对于佛家之评论。这一论述框架,相比于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固然有诸多不同,但其相似之处也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对于后世影响很大,直至今日。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中所形成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虽然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哲学”定义有关,但最初当是受到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的影响。

### 三、研究资料的共用:以理气论为例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熹的论述,不仅接受了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的论述框架,而且在研究资料的引述方面,也多有参考,并进而对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产生影响。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在论述朱熹理气论而讨论理与太极的关系时,指出:“理与太极,同为一物,凡分析一切万象,横于其根底者,太极也,太极即理也,故曰:‘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曰太极。’太极与理,情形之异耳,横于万物深底而观,则曰太极;与理与气相对而观,则曰理而已。”<sup>④</sup>与此相应,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则说:“(晦庵)曰:由其横于万物之深底而见时,曰太极;由其与气相对而见时,曰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1~2页。

② 周予同:《朱熹》,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9页。

③ 冯友兰在后来论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曾说过:“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17页。

④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卷四,金范臣译,参见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印本,第2页。

理。”<sup>①</sup>在远藤隆吉那里，“横于万物深底而观，则曰太极；与理与气相对而观，则曰理而已”一句，并非朱熹所言，而在蔡元培那里却成为朱熹所言，而且后来谢无量《朱子学派》和周予同《朱熹》又引述了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的这一说法<sup>②</sup>。但据爱如生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朱熹未有这样的说法。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在论述朱熹理气关系时说：“理者，形而上之道，所以生万物之原理也；而气者，形而下之器，率理铸型之质料也。”<sup>③</sup>与此相对应，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则说：“（晦庵）又以形上、形下为理气之别，而谓其不可以时之前后论，曰：理者，形而上之道，所以生万物之原理也；气者，形而下之器，率理而铸型之质料也。”<sup>④</sup>在远藤隆吉那里，“理者，形而上之道，所以生万物之原理也；而气者，形而下之器，率理铸型之质料也”，并非朱熹所言，而在蔡元培那里却成为朱熹所言。后来，周予同《朱熹》又引述了蔡元培的说法<sup>⑤</sup>。但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朱熹曾说过“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而没有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引述的所谓“所以生万物之原理”“率理而铸型之质料”的说法。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在论述朱熹所谓气的差异时，指出：“理者，完全各物而实现者，以气之不同也，曰：‘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不能无偏。’理虽无差别，而气有种种之别，或清爽也，或昏浊也，一一难以枚举。此即万物之所以有差别也。然无一非有太极也，其状恰如宝珠之在水中。圣贤之在其中，则如在清水中也，其精光自然发见；至愚不肖之在其中，则如在浊水中，非澄去泥沙，则其光不可见。”<sup>⑥</sup>与此相对应，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说：“（晦庵）曰：理虽无差别，而气有种种之别，有清爽者，有昏浊者，难以一一枚举。曰：此即万物之所以差别，然一无不有太极，其状却如宝珠之在水中。在圣贤之中，如在清水中，其精光自然发现；其在至愚不肖之中，如在浊水中，非澄去泥沙，其光不可见也。”<sup>⑦</sup>后来，周予同《朱熹》又引述了蔡元培的说法<sup>⑧</sup>。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朱熹只有与之相类似说法。据《朱子语类》载，朱熹说：“理者，如一宝珠。在圣贤，则如置在清水中，其辉光自然发见；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浊水中，须是澄去泥沙，则光方可见。”<sup>⑨</sup>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熹理气论的论述，某些研究资料很可能是从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中转引而来，并且又被谢无量《朱子学派》和周予同《朱熹》所引述。

此外，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熹心性论、工夫论的论述，其中所引述研究资料，也多少参考了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比如，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在论述朱熹所谓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关系时说：“气质之性，有形质而后生，惟然，无形质则本然之性已无安置，所以云为之地位。”<sup>⑩</sup>与此相对应，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说：“（晦庵）曰：气质之心（性），虽是形体，然无形质，则本然之性无所以安置自己之地位。”<sup>⑪</sup>周予同《朱熹》又引述了蔡元培的说法<sup>⑫</sup>。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朱熹未有这样的说法。又比如，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在论述朱熹关于心性情关系时说：“心者，统情与性者也。故自性之方面观之，心寂然而不动；自情之方面观之，则感而遂通矣。”<sup>⑬</sup>与此相对应，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说：“（晦庵）曰：心，统性情者也。由性之方面见之，心者，寂然不动。由情之方面见之，感而遂通。”<sup>⑭</sup>周予同《朱熹》又引述了蔡元培的说法<sup>⑮</sup>。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朱熹也未有这样的说法。再比如，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说：“朱子更进而示四端七情之出处，以为四端自性而发，七情自四端而发出，即如哀惧之

①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 1910 年，第 172 页。

② 谢无量：《朱子学派》，中华书局 1916 年，第 62 页；周予同：《朱熹》，第 21 页。

③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第 2 页。

④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 173 页。

⑤ 周予同：《朱熹》，第 20 页。

⑥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第 3 页。

⑦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 173 页。

⑧ 周予同：《朱熹》，第 22 页。

⑨ 黎靖德：《朱子语类》（二）卷十七，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375 页。

⑩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第 4～5 页。

⑪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 174 页。

⑫ 周予同：《朱熹》，第 25 页。

⑬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第 5 页。

⑭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 174 页。

⑮ 周予同：《朱熹》，第 26 页。

自恻隐而发,怒恶之自羞恶而发也。然不推及其说曰但分七情而不可配四端,七情者自贯通乎四端者也。”<sup>①</sup>与此相对应,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说:“(晦庵)谓七情由四端发,如哀惧发自恻隐,怒恶发自羞恶之类。然又谓不可分七情以配四端,七情自贯通四端云。”<sup>②</sup>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朱熹仍未有这样的说法。还需指出的是,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论朱熹的工夫论,分为“格物穷理”“存夜气”“静坐”三节;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论朱熹工夫论,则分为“穷理”“养心”两节,而“养心”主要讨论“存夜气”和“静坐”。

由此可见,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论述朱熹学术,有些研究资料取自于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当然,也有不少新的研究资料,诚如以上所引蔡元培自己也说:“叙述的材料,亦多取给于此书,而详其所略、略其所详的却不少。”

#### 四、基本观点的互通:以理气二元论的观点为例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不仅其中有某些研究资料可能取自于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而且也得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进而影响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以下以朱熹哲学属理气二元论为例进行分析。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说:“朱子承伊川之思想,主张理气二者,且周子以太极断理,故朱子之所谓理,延蔓宇宙,业已无论矣。与此相对者,有气。朱子达到理气之观念之进动如此。”又说:“理与气不能相离而存。无此气,则理无所挂搭;无此理,则气以无形而不可见。故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是故理与气者,不可论时之前后。”“理与气者不可以时之前后而论,以自存的资格为其根本的,气为附随的。”还说:“虽然朱子所存理气之观念,非有如西洋近世哲学家之倡导‘实在’与‘现象’之说者也,不过理气二元结合而成个个之现象也,但理对气为自存之资格上之根本而已。”<sup>③</sup>显然,远藤隆吉既认为朱熹是理气二元论,又认为在朱熹那里,理比气更为根本。

1904年,王国维发表《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后更名为《论性》),既认为“伊川纠正明道之说,分性与气为二”,又认为“朱子继伊川之说,而主张理气之二元论”<sup>④</sup>。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说:“晦庵本伊川理气之辨,而以理当濂溪之太极……又以形上形下为理气之别,而谓其不可以时之前后论。”<sup>⑤</sup>虽然蔡元培没有明确说朱熹的理气论为二元论,但谢无量、周予同则由此而得出朱熹为理气二元论的观点。

谢无量《朱子学派》说:“朱子之纯正哲学,本诸濂溪、伊川。取伊川所立理气之名,而以理当濂溪之太极。”<sup>⑥</sup>这里所谓“以理当濂溪之太极”,明显来自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的说法。《朱子学派》还说:“朱子虽以太极即是理,然以理气‘决是二物’,并为宇宙之原理,故朱子实是理气二元论。”<sup>⑦</sup>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更为明确指出:“明道之宇宙观,为气一元论;伊川之宇宙观,为理气二元论。朱子承伊川,其说益密。”<sup>⑧</sup>又说:“朱子既以理搭于气而行,又谓理气不可分先后,盖认理气为决然二物,此所以名之为理气二元论也。”<sup>⑨</sup>“朱子所谓理,当周子所谓太极;朱子所谓气,当周子所谓阴阳两仪;是以朱子但说理气二元也。”<sup>⑩</sup>

此后,不少学者都认为朱熹主张理气二元论<sup>⑪</sup>。赵兰坪根据日本高濂武次郎《支那哲学史》编译成的《中国哲学史》,有专门一节讨论朱子的“太极及理气二元论”<sup>⑫</sup>。1926年,日本渡边秀芳《中国哲学史概论》在中国出版,该书认为,朱子综合周敦颐的太极说和程颐的理气二元论,在理气之上再置太极,“而

①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第5页。

②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175页。

③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第2~3页。

④王国维:《论性》,载《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35页。

⑤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172~173页。

⑥谢无量:《朱子学派》,第62页。

⑦谢无量:《朱子学派》,第65页。

⑧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中华书局1916年,第32页。

⑨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第57页。

⑩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第59页。

⑪乐爱国:《民国时期对朱熹理气论的不同解读》,载《人文杂志》2013年第3期。

⑫赵兰坪:《中国哲学史》卷下,第94页。

欲抱二元于一元”，“是一个一元的二元论者”<sup>①</sup>。这一观点为周予同所接受。周予同《朱熹》赞同所谓朱熹继承程颐而主张理气二元论，指出：“朱熹之本体论，简言之，实理气二元论之继承者。”<sup>②</sup>但是又认为，朱熹杂糅周敦颐的太极说，是“采用‘太极’一术语以当理，而与所谓‘气’相对，以自成其二元论也”，所以，他赞同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称朱子“是一个一元的二元论者”的观点，指出：“朱熹当考究宇宙之本体时，主于太极一元论，即理一元论；而说明现象界之体用时，则又主于理气二元论。故其‘理’字的含义实歧为二：一为当于太极之理，一为与‘气’对待之理。简言之，即朱熹实为一元的二元论者（日本渡边秀方之《中国哲学史概论》，即主此说）”<sup>③</sup>。

把朱熹的理气论看作二元论，是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这一观点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王国维的《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和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如上所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的影响。当然，在这一观点的形成过程中，民国时期的学者又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和创新。

## 五、创新与问题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熹学术的论述，不仅参照了日本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的论述框架，而且对相关的研究资料和学术观点也多有参考，并进而对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产生影响。但是又必须看到，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更多的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学术发展过程。

在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中，除了有学者认为朱熹主张理气二元论之外，还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批评，更有学者强调朱熹所谓“理先气后”，而把朱熹归于理一元论。1925年，黎群铎发表《晦庵学说平议》，该文引述朱熹所言“理与气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并据此认为，朱熹有许多说法，“似乎二元而实非的”，所以，“理气在他学说中非二元的”<sup>④</sup>。该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被收入许啸天所编《国故学讨论集（第四集）》（上海群学社1927年出版），其中的观点不断得到发挥。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则把朱熹所谓“理先气后”解释为“逻辑在先”，并影响至今。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对于朱熹哲学的研究，虽然有些观点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在于学术的不断创新。而且，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除了在理气论方面，在心性论、工夫论以及朱陆异同等诸多问题上都有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尽管民国时期乃至当今的朱熹哲学研究，是在不断创新中得以发展，但是，最初在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影响下而形成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即从理气出发，分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从理气出发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在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那里已经形成；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最早接受这一论述方式，并对后来的朱熹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无论是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还是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他们都没有对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作出专门的论证，尽管远藤隆吉在《支那哲学史》中说过：“（朱熹）平生所作有文一百卷，生徒问答八十卷，而足以窥其哲学思想者，皆系后人之编纂，为《朱子语类》《朱子语录》《朱子文集》《朱子书节要》等。”<sup>⑤</sup>从这一论述似乎可以看出，远藤隆吉之所以从理气出发阐述朱熹哲学，其依据在于《朱子语类》从“理气”出发<sup>⑥</sup>。问题是，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以“理气”开始，源自于朱熹门人黄士毅的《朱子语类》，其中说道：“有太极然后有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然后有性命之名，而仁义礼智之理则人物所以为性命者也。所谓学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极天地为始，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与夫古学之定序。”<sup>⑦</sup>显然，黄士毅的《朱子语类》以

① 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近世哲学》，刘侃元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67~69页。

② 周予同：《朱熹》，第19页。

③ 周予同：《朱熹》，第21页。

④ 黎群铎：《晦庵学说平议》，载《国学丛刊》，1925，2(4)，第69~70页。

⑤ 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第3页。

⑥ 宋代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卷一、卷二为“理气”，卷三为“鬼神”，卷四至卷六为“性理”，卷七至卷十三为“学”，此后，依次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易》《尚书》《诗》《孝经》《春秋》《礼》《乐》以及其它。

⑦ 黄士毅：《朱子语类后序》，载《朱子语类》（一），中华书局1986年。

“理气”开始,依据的是朱熹的宇宙论,而不是其哲学体系本身。所以,以《朱子语类》从“理气”开始为依据证明朱熹哲学应当从理气出发,其理由是不充分的。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对于“哲学”的定义,以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大块,实际上证明并强化了这种从理气出发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而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采用这样的论述方式阐述朱熹哲学,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问题是,根据“哲学”的定义,从朱熹哲学体系中提取出对于理气问题的讨论,并以此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是否能够合理地解读朱熹哲学的其它所有问题?当今的朱熹哲学研究,虽然都是从理气出发,但是却出现了一些重要观点的分歧<sup>①</sup>。因此,对这种一直沿用至今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于1939年出版的《新理学》中,既阐述了朱熹的理气论,同时还专门讨论了朱熹的“道”。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冯友兰晚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在阐述朱熹哲学时,除了讲理气,还通过阐述朱熹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强调朱熹的“道”是“‘理’与‘气’合的产物”,是“大化流行”<sup>②</sup>。相对于一直沿用的从理气出发的论述框架而言,这实际上开启了朱熹哲学研究的新路径,而且表明现代朱熹哲学研究正在逐步摆脱日本学术的影响。

## Japan's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Zhu Xi's Philosoph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e Aiguo (Xiamen University)

Chen Hao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of Zhu Xi's philosoph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not only the scholar's academic discussion at that time, but also their int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Zhu Xi's philosophy research in Japan. The influence of Japan was not only the translations of scholarly works, but also the similarity of the discourse framework of Zhu Xi's philosophy, the quoted research materials and even the basic academic viewpoint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during the period, the framework of the exposition of Zhu Xi's philosophy, which started from the doctrine of "li(理)" and "qi(气)", was originally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search in Japan. Since the framework still has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d,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further rethink.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u Xi's philosophy; the influence of Japan; the doctrine of "li"(理) and "qi"(气)

●作者地址:乐爱国,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Email: leaiguo@xmu.edu.cn。

陈昊,厦门大学哲学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07)

●责任编辑:桂莉

①参见乐爱国:《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阐释》,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的“理”之不同诠释》,载《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6期。

②乐爱国:《冯友兰晚年朱熹哲学研究的新意》,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